

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

汉代的山东籍太学学生

又到九月开学季。这个秋天,将有許多齐鲁学子跨进全国各所大学的校门,开启人生重要的一程。其实,早在2100多年前的汉代太学,就有許多山东籍学子,用自己的勤奋和坚持,演绎出一个个流传至今的故事。

太学是汉代全国最高教育机构,开设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等课程。西汉早期只有私家教学,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。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、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,在长安建立太学。据记载,汉代太学学生的人数,最高时达到3万多人,汉代的太学有些类似于现在的大学,太学的一些制度,与如今的大学有不少相似之处。

□纪习尚

公孙弘： 提议建立太学

汉武帝之所以要“建太学、揽人才”，和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。西汉初期的七十多年，在连年战乱后，主要采取与民生息、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，人才上也多起用开国功臣及他们后代。到了汉武帝时，这些功臣的后代影响力逐渐减弱，而国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方面的事业都有进步，对文官的需要大大增加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建立一个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专门机构——太学，就成了历史的必然。

领衔提出建立大学的公孙弘，是齐地菑川国（今山东省寿光市）人。他年轻时当过狱吏，因获罪被免职，失业后家庭陷入贫困，靠在海边放猪维持生计。

公孙弘虽然生活艰辛，但没有放弃学习，四十多岁时还坚持研读《春秋》。六十岁时，公孙弘终于被征辟为“博士”，后来又做过御史大夫、丞相，并因为贡献卓越被封为“平津侯”，可谓“逆袭成功”的范例。

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，此后太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。太学招收的正式学生，称为“博士弟子”，由朝廷直接选拔。特别的学生，称为“如弟子”，由地方推荐、朝廷审批。太学建立初期，“招生”人数很少，拿正式学生来说，公元前124年首次招生时，只有不到五十人，汉昭帝时为一百人，汉宣帝时也只有二百人，正因为如此，西汉的太学不好进。山东学子想要进入太学，要经过地方官举荐、二千石以上高官考察、大儒面试，因此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，方有进入太学学习的机会。

虽然竞争如此激烈，在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太学中的山东籍学子是最多的。史籍中虽然没有留下汉代太学学生的完整名单，但零星提到了一些人物的经历，但有人翻检史书发现：西汉有记载的太学正式学生中，山东一地就占了三十二人。这三十二名山东籍太学正式学生中，齐国一人、鲁国六人、济南郡三人、琅琊郡八人、泰山郡二人、东平郡二人、千乘郡一人、东海郡六人、北海郡一人、菑川国一人、山阳郡一人。山东各地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都有太学学生，他们中有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成绩，如鲁国人韦贤、孔光担任过丞相；千乘人兒宽、东海人匡衡、琅琊人师丹担任过御史大夫，东海人马官、琅琊人伏湛担任过大司徒。

这主要是因为山东文化底蕴深厚，山东在先秦时期大体属齐、



汉代太学讲学场景

鲁两国。齐国有“商工之业，鱼盐之利”，早在姜太公时期就是大国，经济发达；鲁国是礼乐之邦，孔子的故乡，“周礼尽在鲁矣”，文化发达。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太学学生，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。

兒宽：

参与制定发布《太初历》

兒宽是千乘郡（今山东省广饶县）人。他靠读书改变命运，最后位列三公，是一位非常励志的人物。兒宽小时候家里没有余力供他读书。他求学时曾在学校的伙房帮厨，还经常为附近的农民帮工种田，勉强维持学业。在田里劳动时，兒宽总是在锄头上挂一本书，休息时拿下来翻开读一段。后来，兒宽通过考试脱颖而出，被任命为掌故，接着又任廷尉文学史卒，开始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从政生涯。

《汉书》说兒宽不善言辞，性格“温良”，文章写得也好。兒宽担任左内史时，“劝农业，缓刑罚，理狱讼”，注重发展农田水利，体谅民间疾苦，治理很有成效，得到人们的拥戴。有一次他负责征收军务粮草，如果进度过慢他就会受到处罚。人们知道后，“大家牛车，小家担负”，车拉肩扛，纷纷前来交粮，以表达对他的支持。

要说兒宽最重要的贡献，就是制定中国最早的历法——《太初历》。汉武帝元封七年，西汉已经建立近百年，但还在使用秦朝历法，不够精确。司马迁等人上书“历纪废坏，宜改正朔”，建议重新制定历法。汉武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兒宽，他组织了二十多人，当年就制定并发布了《太初历》。

《太初历》是中国古代一部比



匡衡



郑玄

较完整的历法，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，这部历法的很多元素我们至今还在使用：它首次将一年的开始月份定为正月，而不是过去的十月，所以新年的第一天被称为“正月初一”，并将“二十四节气”纳入《太初历》，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。

兒宽后来被任命为御史大

夫，位列三公，在职八年后去世。他的墓位于山东省广饶县，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，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匡衡：

凿壁借光，成为名相

匡衡是西汉经学家，东海郡（今山东苍山县）人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他少年时学习刻苦，但家里很穷，连蜡烛也买不起。匡衡晚上想读书，苦于没有照明，而隔壁人家晚上点了好几支蜡烛，光线明亮。为了借用这宝贵的烛光，他偷偷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，借着从洞口穿过来的微弱光线，坚持读书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凿壁借光”典故。

匡衡还有一个“佣作换书”的故事，村里有户富人，家里藏书很多。匡衡渴望读书但买不起书，就对这个富人说：“我可以帮你家干活，不需要你付给我工钱。”富人听了很奇怪，就问他：“不要钱，你要什么呢？”匡衡答：“允许我遍读你家的书。”

《史记》记载，匡衡读太学时，靠给别人打工，才凑够伙食费。可能是由于过多的工作占用了他的读书时间，他虽然刻苦攻读《诗经》，但连考九次才中了“丙科”，得到一个平原文学史卒的小官。也正是因为屡败屡试，匡衡学问很精到，当时人们流行一句话：“无说诗，匡衡来，匡说诗，解人颐。”意思是，听匡衡解读《诗经》，能让人乐而忘忧。

匡衡的学识后来得到好儒的汉元帝的赏识，曾请他到官中讲课，一时风光无比。他的职位也从最初的文学史卒，到郎、博士、太子少傅、光禄勋、御史大夫、丞相，最后被封为侯爵，可谓“连升七级”。司马迁认为他“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”。

郑玄：

经学家，校勘儒家经典

东汉儒学大师、经学家郑玄，是北海郡高密（今山东省潍坊市）人。他从小一心读书，无意仕途，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郑玄十一二岁时，随母亲到外婆家做客，宴席中的人们“美服盛饰，语言通了”，只有郑玄默默坐在一边，不说一句话。母亲私下里批评他，郑玄平静地回答说：“穿好看的衣服，说好听的话，这不是我的理想。”外在的浮华不能吸引他，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。

年轻时，郑玄曾担任乡里的嗇夫，负责调解纠纷、征收赋税，但与做官相比，他喜欢的还是读书。一次休假回家，他坚决地对父亲说：“我想辞掉工作，到外面读书。”

郑玄入太学攻读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《三统历》《九章算术》，又从张恭祖学《古文尚书》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等，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。游学归里之后，聚徒授课，弟子达数千人。

成名后，郑玄多次拒绝权贵的征召，一心著书。鉴于当时儒家经典版本众多，学说芜杂，“学徒劳而无功，后生疑而未正”。郑玄博采众家学说，“删裁繁芜，刊改漏失”，对儒家主要经典进行了校勘注解，极大地方便了学生学习。

有意思的是，当时的国相孔融非常看重郑玄的学识，认为他虽然没当过大官，但功劳不在他们之下，特意要求高密县将郑玄老家所在的乡改名为“郑公乡”，以资纪念。

今天潍坊市的“郑公街道”，就是当年“郑公乡”的传承，2022年8月，郑公街道组织了纪念郑玄诞生1895周年文化交流活动，郑玄可谓功垂千秋。

孔僖：

高情商典范

孔僖，鲁国（今山东省曲阜）人，孔子第十九代孙。他为人处事不卑不亢，表现出了很高的情商。在太学学习时，孔僖有一次读到吴王夫差早年夺得霸业，晚年却“国破身死”的故事，感叹道：“如此，这是所谓画虎不成反为犬！”旁边的同学附和说：“武帝年轻时励精图治，文治武功卓著。但后来任意放纵，和夫差也差不多。”这碰巧被隔壁宿舍的学生听到了，这个学生凑过来说：“这样，武帝也是狗吗？”孔僖没有理他，对方讨了个没趣，心生怨恨，把这事捅到皇帝那里。孔僖赶紧上书解释说：“我如果被您治罪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但天下的人怎么看您？还会有人敢说真话吗？”汉章帝最终没有追究，反而任命他为兰台令史。

后来，汉章帝东巡，路过曲阜时，举行仪式祭奠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。孔僖也参加了，汉章帝看到他，得意地说：“今天这么大的典礼，对你们一家是莫大的光荣吧。”孔僖回答说：“圣明的帝王，没有不尊师重道的。陛下今天来，是致礼先师，向全天下表明重视教育的决心，我们不敢承受。”皇帝听了哈哈大笑，对他有礼有节的回答很满意，任命他为郎中。

西汉时期，著名的山东籍太学学生还有金乡县的范式，他一诺千金的故事至今传诵，现在金乡县有一组再现他和好友张劭“鸡黍之约”典故的雕塑；还有“端诚于国，不顾患难”的政治家、诸城人师丹，与蔡邕共同奏定《六经》文字的山东定陶人张驯等。